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HANYU FANGYAN YANJIU WENJI

李如龙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李如龙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269-5

I. 汉… II. 李…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H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9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ǔ FāNGYÁN YANJIŪ WÉNJÍ

汉语方言研究文集

李如龙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269-5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32.00 元

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代序)

从参加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开始,我踏上了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片热土真是风光无限,魅力无穷!自己做调查,总怕机会太少,时间太短;带着年轻人去完成各种课题,则在兴奋之余感到队伍不够大、人手不够用;看到许多鲜活的语言现象正在隐去,就想,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待到林深草盛的沃野荒漠化了,热土也就不热,甚至要变成冻土了。为此,在高校任教五十年来,我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教方言课、带学生研究方言,始终没有断过线。不论是学生们还是其他学者所发表的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都会使我感到振奋,因为这片热土又一次展示了她的娇姿——无论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一条枝芽或一丛新株。就是为了捕捉这种兴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没有想过要离开这片热土。我常常自称一介老农,以采集、交流土产为业。如果别人也这样看待我,我会视为一种褒扬。

听说,有的研究方言的学者不喜欢别人尊称他为“方言学家”,必要正名为“语言学家”,好像“方言学家”低了一等。其实,方言不就是语言吗?只是因为方言之间还有“通语”,所以才称为“方言”。完整的方言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从调查记音开始,语音的描述和分析:音值,音类,音节结构和连音变化系统等等;词汇定位和定性:固有的,借用的,继承的,创新的,同义的,反义的等等;词义的说解:本义,引申义,活用义,附加义等等;语法的分析:词的聚合关系——词类及其特征,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和规律,句式和句法等

等。所有这些全面、系统的语言研究，都是方言研究的课题。当然，不论通语和方言，你的研究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只涉及一个方面。如若做了全面的研究，方言研究家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因为他们研究的依据是自己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像研究通语的书面语的学者那样，所用的材料是前人预先记录下来的。调查研究一种前人不知道的方言，就像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当中的每一步可能充满着艰辛，却是从过程到结果，始终充满着乐趣。过程的乐趣是发现、认知，为现象作了解释；结果的乐趣是：不论成功或不成功，都获得了新的经验。梁启超说过，人生不能没有乐趣。劳作、游戏、艺术和学问都是“趣味的主体”。然而，只有学问才能使人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切实的体验。

然而，方言学确实是曾经受过歧视的。扬雄的《方言》是第一部根据口语语料编成的比较方言词汇。从它成书的公元 121 年到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的 1924 年，相隔 1800 年。其间，除了为《方言》作注的郭璞以外，那些续补的仿制之作，就像罗常培说的那样，“始终在‘文字’里兜圈子，很少晓得从‘语言’出发。能够了解和应用方言本书的条例、系统、观点、方法的，简直可以说没有人。”（《方言校笺及通检·序》，中华书局，1993。）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一开始就出现了高峰，扬雄的《方言》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为什么却是紧接着就走进漫长的低谷呢？这显然与通语的强力影响有关。汉代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书面语获得了显赫的地位，《方言》问世之后，《说文解字》和《切韵》为通语给定了字形、字音、字义，随后便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成了科举取士和出版业的官方语文标准。从此，“殊方异语”被视为愚民百姓的乡谈、俚语、白话、平话，自是不登大雅之堂。在书面语里，更是成了匡正的对象。文人学士们尽管口里说的都是“时言

野语”，若把它写成文字，只能权当打趣，轻易是不能写入诗文的。中国现代语言学虽然跟随着世界的新潮流，逐渐从文献、书面语的研究转向实际口语的考察，但是“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研究一直是以通语为主，方言只是作为陪衬；在通语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也是书面语的研究重于口语。这都说明了文化上的历史传统的影响是很难摆脱的。

方言研究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方言存在的形式总是粗糙的、不修边幅的、未经修饰的。经过知名的文人加工过的山歌、故事、传说，像冯梦龙所编的《山歌》以及后来用吴语写成的小说《九尾龟》、《海上花》等并不多见。这一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原生态的声乐。原生态的唱法不也是到了近些年才带着几分羞涩和野性，尾随在民族唱法之后，走上了“青歌赛”的舞台吗？原生态音乐确有几分粗犷，但她毕竟是民族音乐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民族音乐的主体特征，也带有自己的几分独特。这些独特的成分和风格有时还会被主体民族音乐吸收。与此同理，衣冠褴褛的方言已经让我们体会到她在体现现代汉民族语言的特征上不但是充分的，而且是多样的。而现代雅言在接纳方言成分上，也是经常可见的、不可缺少的，也是饶有效果的。方言和原生态的音乐，本来就血脉相连、情性相通，二者都生长在山野海隅，并且早就融为一体，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风景线了。她们虽然不像高贵而洁净的庙堂、工整而繁华的街市那样，被雕琢得工巧别致、金碧辉煌，却保持着一种粗野中的质朴和秀丽，一种杂乱中的洒脱和自然。

在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上，只要你认真地考察就会发现，这还是一座立体的宝库。她的凹凸的地面排列着大小、高高低低的山河，地下堆砌着不同时代沉积下来的岩石和泥沙，就像纵横交错的山川和上下叠置的地质层，记录着每一片陆地和水面形成的

年代和历史那样，每一种方言都用自己的音和义、词和语记载着当地的民族史、移民史、战争史、垦殖史、交通史、建筑史、文化史。地面上生长的各种林木和花草，则像是方言的口头文学艺术的加工和提炼：山歌、童谣、说唱、戏曲、传说、故事。不论是“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江南水乡，或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国草场；不论是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发出的缠绵悱恻的交响曲，或是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荒原上展现出来的雄伟壮丽的图景，都蕴藏着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方言诠释。

在这片热土上耕耘，我是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和能力的低下。方言调查必须从单点入手，整理音系，记录词汇和语料，这只是地形、地貌、地面物的察看和登录。只有经过不同方言的比较、古今语言的比较，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地面的特征；而要真正理解这些特征，又非得考察连片的山川，发掘地下的堆积，辨认地面植被所造成的花木果蔬。这就是多视角、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就是方言研究的理论提炼，这就是为方言事实所做的解释。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方言学者在调查整理音系、编写词典、描写语法的基础上，正在联系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进行历史层次的比较研究；正在运用方言韵书、地方戏曲和小说、民歌等语料以及百年前教会罗马字方言语料进行方言史的研究。在联系历史文化资料进行方言文化研究上，也获得了不少成果。还有些学者正在整合大批量、大面积分布的方言材料，制作大型数据库，进行大规模的比较，乃至和汉藏系诸语言进行类型学和发生学的研究。汉语方言学正在形成纵横交错、内外兼通的整体研究和立体研究。这些新的进展，为汉语方言的热土又开辟了一条条新路。沿着这些路子，一定可以开辟出一层层的新天地。作为一个老农，我为许多年轻人的创举而感奋。我愿意为他们喝彩、加油，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贡献自己的一份微小的余力。

王福堂在总结 20 世纪的汉语方言学时认为,80 年代之前的汉语方言学只是个草创时期,近二十多年来才进入提高时期。新时期的表现是,方言描写全面和深化了,方言研究的深入则表现在“由现象的描写趋于规律的探求,由纯语言研究进而联系社会原因”。关于描写方言和理论探索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探求规律只有在描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但从根本上看,描写方言现象只是手段,探究规律才是最终目的。而且,也只有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描写方言现象,也才能在描写中不致盲目,不致对某些重要现象视而不见。”(王福堂《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于方言的调查描写和理论探索的关系确实很值得深入研究。我最近形成的想法是,这二者不能切为两段,先做描写再探索规律,而必须是齐头并进,应该并重、互动、互相促进。只是调查描写时,在不同阶段所用的理论方法有别。开头用的是记音、审音、构造语音系统的理论,后来用的是语音、语义纵横两向比较的理论,在探求规律时所作的描写又与起始阶段的描写不同。无论是在初始的调查或后期的比较研究,事实的描写和理论探索都应该是并驾齐驱、互相支持、相互发明、相互促进的。这是我最近读了两本外国汉学家的书得到的感想和启发。我愿意提出来和大家分享。

其一是张卫东翻译的《语言自述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的作者威妥玛氏。这位英国人 1841 年来华,在公使馆当过秘书和公使,教过北京话。他所编的这部汉语课本,非常注重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注意字和词之间意义的关联所造成的便捷和不关联造成的误导,从而强调单音词的教学;看到了词的多功能性(如名词和动词的共用)。他断言,汉语在语法上“不允许屈折变化占有一席之地”。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中国语法学家不是还在为汉语有

没有形态变化争论不休吗？有的学者还千方百计在寻找汉语的曲折形式。一个外国人，学习、调查北京话和编写课本的过程中，就探知了这么多重要的汉语的规律。这些理性认识是他在学汉语、教汉语的实践中形成的，也一定促成了他学汉语、教汉语的成功。

另一位使人钦佩的汉学家，是 20 世纪初的瑞典人高本汉。他研究汉语和汉字，研究古今汉语的语音、词汇，调查了数十点的方言，并且拿汉语和泰语、藏语作比较。他不但对汉语的单音词根和复合词的复杂关系，对缺乏形态变化、主要用语序来表明结构关系，不用标点，语句多歧义等有透彻的了解，而且对曾经盛行一时的“单音节孤立语”的中国语是“初等的”落后语言提出了相反的假定：“现在单音缀的与无语尾变化的中国语，久已脱离了原始未发展的境地，而作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较之英语更为深进。”（《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34，第 9 页。）鉴于汉语和藏语的关系，他看到，古藏语有复辅音群，多音词有形态，推测“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后来早在纪元前，就与藏语分手，成为单音节孤立语。对于这个推测，他还睿智地提出了原因的说明：“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同上书，第 15 页。）高本汉很了解中国的“方言俗语”之间可以用书写的文言来沟通无阻，他还说：“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在的基础降服于他人了。”（《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商务印书馆，1931，第 50 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位智者的诸多言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辉，给我们启发。一个欧洲人，面对着陌生的汉语汉字和汉语方言，如果没有可供考察、可供比较和论证的理论，怎能得出这么深切的认识呢？我们应该大胆承认，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是比较欠缺思辨传统的。我们向西方学习，首先就是要学这种思辨的习惯和理论追求的精神。事实上，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也正是这样做，并且由此而获得进步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研究汉语既要坚持务实的精神，又要解放思想，讲究方法。只要我们努力发掘语言事实，经过归纳和演绎，经过内外、古今、南北的比较，我们一定能在自己的故土培植出有自己特色的果实来，这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会是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汉语方言学者应该有这样的信念，也应该有这样的追求。

目 录

汉语方言学这片热土(代序).....	1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1
声韵调的演变是互制互动的	17
关于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研究	34
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	47
晋语读书札记	72
跳出汉字的魔方	90
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	96
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	112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	134
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	151
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 s 的研究.....	164
论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	180
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	195
建瓯话的声调.....	226
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245
论“不对应词”及其比较研究.....	260
从闽语的“汝”和“你”说开去.....	276
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	286
闽南方言的“相”和“厮”.....	300
说“八”.....	307

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	312
闽南方言和台语的关系词初探·····	338
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350
论语言的社会类型学研究·····	368
闽南方言与闽台文化·····	382
从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	402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	432
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	447
从地名用字的分布看福建方言的分区·····	459
四个福建地名用字的研究·····	480
后记·····	494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一 必须对方言作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入手,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系,说明该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特点。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因为中古音(广韵系统)作为书面语的标准音曾经统治中国文坛一千年,在中古时期,这个语音系统是有代表性的;对于各地方言也确实有过长时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普通话也是影响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拿这两种参照系来考察方言材料,确能对该方言的特点获得相当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方言事实的了解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了,考察语言现象也增添了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这套传统模式就逐渐显出了它的缺陷。

首先,中古汉语并非现代各方言的共同的祖语。应该说,汉语的方言多数在汉唐之际就形成了,像湘、赣、吴、闽、粤诸方言都还可以追寻到先秦时代楚、吴、越、南楚等古方言的源流。还应该指出,正像南北方汉人身上都混有其他民族的血统一样,南北的各种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杂有其他原住民族或入主民族的语言成分。因此,中古汉语和现代各方言的关系并非直接的继承关系

或单一的延续关系,而是历史上的一种横向的渗透关系:作为书面的共同语,对于各种方言的口语总是要施加着某种影响。其实,广韵系统究竟是不是中古时期共同语的语音系统,至今还有争议。可见,中古音只能作为参照系,帮助人们了解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而不能作为考察方音流变的出发点。

其次,就横向的渗透说,历史上不但有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而且势必还有方音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地理方面说,邻近的方言由于社会生活的接触,甚至通行双方言,方音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湘方言的北面和西面都是官话,在交通发达的铁路沿线的新湘语已经和官话相差无几,北片吴语和赣语同下江官话相互穿插(例如南通有吴语,九江则有赣语),利用长江密切交往,官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从历史上说,大多数方言区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辗转和周折。例如客家先民从中原拔足之后,就经过了长江南北、鄱阳湖周围的栖止和闽西赣南的停留,然后进入岭南的。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的年代,许多方言区都有过人口锐减、迁徙、外移或别方言区的人大量渗入的历史。湘方言区不但有东部长廊十几个县蜕变为赣方言,连腹心地区的老湘语也含有大量赣语的特征,这就是两宋时期赣人大批入湘的结果。某个方言区的人迁往他处,形成方言岛,这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事实,在包围方言的影响之下,这些方言岛也难免发生变化。可见,由于横向渗透的普遍存在,任何方言都有一定程度的混合性质。对于汉语来说,纯之又纯的“谱系树”状的方言分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某方言是某方言的前身,方言间有堂兄弟、叔侄关系等都不是科学的说法。可见,透过方言和中古音的比较来说明方言的特点一定存在局限性,这是历史比较法的先天缺陷决定的。

由于受到方法论的局限,传统的方言研究着重于音韵学关于音类的分合的比较,对方言差异也缺乏科学的认识,好像方言只是

一些“殊方异语”，一些或多或少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差异，把方言和方言差异等同起来。关于“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的说法一直很有市场。结构主义在西方流行之后，中国学者也运用它来研究汉语，但多半用来分析普通话，尤其是书面语的语法，似乎方言口语是不适用这种研究方法的。

诚然，方言和共同语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确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然而这些同异的成分总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任何方言都可以进行系统的结构分析。就语音来说，方言的语音系统之中不仅有古今音类分合和音值演变的特点，而且有声韵调组合的特定规律。最近十几年来对于方言语音系统的研究还跳出“字音”的框框，揭示大量为了表达语义的需要而发生的音节内外的许多变声、变韵、变调的规律，至于方言词汇和语法，也应该有自己的结构体系，只是我们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只要是还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着的方言，不论它通行面多大，使用人口多少，它都应该作为一个结构体系来研究。对于语言来说，任何体系的研究价值都是同等的。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跳出寻求方言差异、概括方言特点的圈子，真正把方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来研究。

最近一二十年间的汉语方言学的研究视野确实正在逐渐地扩大着，除了注意到音义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及方言语法的比较外，有些学者还考察了方言的变异：同一个方言区里新老派的差别；有的注意到了方言地区的双方言现象；有的学者探讨了方言地区的移史和方言的形成分布的关系；有的则研究方言词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这些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是很值得鼓励的。因为汉语的方言历史长、品种多、差异大、情况十分复杂，只有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才能如实地理解汉语方言的真面貌，而多方面的成功研究一定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形成崭新的理论。

二 有必要提倡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那么,从“历史比较”走出来的汉语方言学怎样才能登上自己的新台阶呢?我以为很有必要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

方言既然是同一语言的地域变异,既然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拿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作比较,便应该是方言学的基本方法。

从历史方面说,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方言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语言结构特点,因此不同地域的方言差异往往是不同历史时代语言演变的折射。因此,只要把许多方言都作了比较,人们就一定可以获得丰富的语言史知识。“礼之失求诸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成绩越好,汉语史的结论就越有说服力。可见,真正的历史比较也不能是只拿一种方言和中古音、中古汉语作比较,而应该是就多种方言作比较。

从共时方面说,方言不但受到共同语的一定制约,而且总要和周边方言发生相互的交流。交流越多,彼此间就有越多的类同。拿邻近的方言作比较,我们便可以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渗透关系,探寻方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也才能理解许多方言特点的来龙去脉。

从整个汉语来说,对现代方言所作的比较研究越多,我们对古今汉语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现代汉语共时结构规律的认识应该就会更加接近事实。试想,关于汉语史的叙述如果未能解释已知的方言事实,关于现代汉语的结构体系的描述,如果未能涵盖已知的方言事实,(例如说“广韵的一等韵不可以有齐齿呼的读法”,说“现代汉语只有 l、u、y 可以当韵头”,这就都已管不住方言事实。)这样的理论研究还有什么可取的呢?就这一点而言,方言的比较研究不光是方言学的事,也是把整个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的关键。

汉语方言材料浩如烟海,全面系统地进行具体字音、词汇的比较不但是办不到的,也未必能够达到揭示汉语的演变规律和结构规律的目的。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是可贵的基础资料,有了它,学者可以看到多种方言共现在一个共时平面上的概貌,从中发现进一步比较研究的题目。愿意花时间编制出材料可靠的此类对照表,是值得人们敬佩的,然而如果选点欠妥,条目不当,材料不详,这种对照表也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使方言比较研究更快见效,我主张选择若干要项进行类型比较。前几年关于连读变调的调查和比较以及反复问句的比较研究,就正是这类富于启发性的类型比较研究,并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顾名思义,类型学研究着眼于类型。当然,在不同的类型中也要注意不同的数量分布,从而看出不同类型的主次轻重来,但更重要的是把类型差别视为质的差异,对于不同类型的现象要尽力发掘,力求不遗漏。可以说,类型学的方法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材料繁多的汉语特别重要,特别有效。当然,如果我们对汉语方言还知之甚少,类型学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勉强地说则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发掘了不少的材料,而不及时地转入类型研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重复简单的劳动。现在来提倡类型研究是必要的、适时的。

比较项目的选取是类型研究成败的关键。选取比较的项目既要符合学科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要求,也要运用已有材料作分析,如果已有材料不足,则还必须进行适当的抽样调查。例如句子诸成分的语序是汉语语法的敏感地带,其中动词同时带有宾语和补语的否定式,在不同方言中就发现有多种语序:找不到他/找他不找到/找不他到,这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的项目。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上,为了说明不同的问题,比较项目可大可小。例如有无全浊声母是一种比较,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方言声母系统的大格局。